

马来西亚前政要：两会聚焦民生福祉，体现中国特色治理之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中国每年的“两会”令举世瞩目，也备受全球议论猜测，只因这已成为外方观察并揣摩中国国情发展的一个窗口。

尽管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及其一众附庸盟国，从未间断把中国标签化、妖魔化，并称之为“极权国家”。然而相较于欧美国家的议会，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不曾对他国的治理指手画脚，更遑论动辄对他国作出针对性的立法。更值得它们深思的是，为何中国“两会”聚焦的议题，尽是离不开本国民生福祉。

2022年的“两会”也不例外。尽管预料今年的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既回顾过去一年(2021年)，另一方面也明确且平实的阐述新年度(2022年)的重点工作。

值此国际社会普遍聚焦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以及中方如何因应经济下行压力之际，我特对“粮食安全”

和“绿色转型”两项独感兴趣。

粮食安全未雨绸缪

针对“粮食安全”，最清楚不过的是中方未雨绸缪的布局。3月6日习近平主席就曾告诫称，“粮食安全”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引述习主席针对“粮食安全”的谈话称：“粮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要优化布局，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保证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寥寥数语即已勾勒出中国在粮产保稳布局上的前瞻性。

202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标，达到1.37万亿斤，取得了“十八连丰”，创历史新高。但由于同年中国的玉米价格上涨，储备量低，以致玉米进口升高，进而使粮食进口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意识到“粮安”问题不能全靠进口摆平，习主席在“两会”提出“耕地保护”措施，是值得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的。

中央要和地方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通过强化土地流转用途

监管；推进撂荒利用地；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从而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其中10亿亩建成高标准农田。这是从根本着手保护耕地的治理手段，也是量化耕地面积指标的依托基础。

中方将之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并在最高立法机构通过决议，足以体现中国治理的高瞻远瞩、居安思危。它强调“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是完全务实，并契合时宜的。

在确保“粮食安全”立足本土之余，中方不妨以本身已臻成熟的农业科技，作为推进农业合作的载体，进军近邻东南亚。毕竟，“粮食安全”问题是全球未来面对的共同问题，攸关人类生存福祉。

东南亚国家大多得天独厚，气候土壤相宜，虽是以农立国，却碍于治理短板，以致沃土荒废，农产不彰。倘若辅中国的农业技术与规划，善用荒田原野，不但东道国的农业经济可以有序地纳入正轨，中外的合作体更可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为中国在海外广布粮仓。对中方而言，这是附加的粮食供应链，进可

攻，退可守，其意义与进口粮食迥然不同。

毕竟，东南亚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农产不受季节限制，品类与国内生产者有其互补性。况且，从战略布局上来衡量，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愿景高度契合。

绿色转型节能减碳

在“两会”中，总理的工作报告提及“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的发展目标。

两会期间，3月5日习主席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曾针对减碳节能说，“绿色转型”不能一蹴而成，要先立后破，而不能未立先破。要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不能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

毕竟，中国的国情是“富煤、贫油、少气”，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然而，中国对世界承诺的“双碳目标”——2030年的“碳达峰”与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却驱使她不得不加速减少碳排放。

2021年7月16日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正是中国争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争取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随着2005年欧盟实现世界上第一个碳交易机制，碳排放权或所谓的“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即已成为碳交易市场的买卖“商品”。

碳排放权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纳入碳交易体系的企业每排放一吨温室气体(通常是二氧化碳)，就需要有一个单位的碳排放配额。

相关的配额总量，由各国政府根据国际公约上承诺的减排目标制定，且随时间推移而逐步降低。相关配额来自政府免费发放或拍卖，以及在碳市场向其他国家或企业购买。

近年来，中方凭其硬核科技，屡把沙漠变茂林，植树造林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处于高度发展和在短期内不能立马改变能源结构的两难中，中国的碳排放超过许可额度的机率是存在的。这意味着中方需向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而境外广袤面积的森林绿肺，尤其是热带雨林，正是当前碳交易的理想载体。

广袤的热带雨林自然离不开近邻东南亚，其中尤以婆罗洲为甚。中方若以此作为双方合作的抓手，预料会加速建立起东南亚的绿色金融体系。对东道国而言，既可保全其固有的森林资源，又可以让国库增添其收益。对中方来说，至为明显的是，这可让它更从容的“减碳”。

“节能减碳”目前已是普世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日趋成熟，若能早日完善化、国际化，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召唤下，引领东盟共同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相信届时中国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单会登上新的台阶，同时更会迈向多维发展。

今年假期几天的“两会”信息量大。它没有西方民主议会披上“制衡”外衣的抬杠对峙，有的只是改进民生的国是协商。中外体制，各美其美。治理优劣，自在人心，端不是任何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所能扭曲。
(本文作者：翁诗杰，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椰風飄雨

本报评论员：余凡

佐科总统今年1月17日表明，决定在东加省(Kaltim)北帕纳赞县(Penajam Paser Utara)兴建新首都(KN)。新首都不只是政府办公处，也将持续性转型升级，是经过慎密规划，具高效率、创新势头的现代化城市，是印尼迈向革新、科技发展及绿色经济的根据地。

国家发展部长(Menteri PPN)苏哈尔梭(Suharso Monoarfa)宣称，佐科总统选择将新首都定名为“努山达拉”(Nusantara)；新首都的计划已依法经过国会同意后决定。

反对阵营随即对新首都的计划发起轮番攻击，有“资深记者”隐喻加里曼丹是“精灵(JIN)抛弃孩子的地方”及侮辱性的言辞；有政客盲目指责政府将向中国借贷巨资兴建新首都，更有甚者，还诬蔑说新首都将挤满中国的移民。对此，政府作出了明确的答复。

接着，在遴选新首都特区首长方面，又引发了不少争议和猜测。终于，总统于3月10日在独立宫举办的仪式上，在受邀嘉宾及全体内阁成员见证下，正式委任班庞(Bambang Susantono)及多尼(Dhony Rahajoe)为新首都特

区的正、副首长；获得各界肯定。

总统介绍说，班庞拥有工程建筑以及交通、金融的学位，加上多年的实践经验及亚洲发展银行(ADB)副总统的履历；而副首长多尼在地产开发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和可观的绩效，相信他们能够组建理想的工作团队，配合国家发展部长及工程部长把新首都成功建起。

对于开展兴建新首都的计划时，总统嘱咐特区首长必须与海洋及投资统筹部长密切交流，因为新首都将吸引大批国内外的投资者。其次，总统希望特区首长尽快投入具体的工作。此外，总统更提醒要严格规范新首都特区范围的土地使用权，避免有投机分子炒卖土地。而原属农林部管治的林区，也必须尽快依法移交给新首都特区政府进行建设部署。

总统也要求有关新首都的2022年第3号宪法的详细释法及条款，能在3月份总统出台。还有，特区政府必须尽可能多让当地子民参加政府工作，并给予适合的职位。最后，总统交代做好宣传普及工作，譬如“占全国56%的民众居住在爪哇岛”，国内生产总值(PDB)的58%在爪哇岛，政府必须平衡发

展。而雅加达特区也可以改良环境，并不是被抛弃。

《时代网》12日报道，日本软银(Soft Bank)于11日确认不参与在北帕纳赞县兴建新首都的投资，消息引发各界热议。2020年，海洋及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Luhut Pandjaitan)透露，软银有意融资金达1000亿美元，支持新首都的工程建设。为此，印尼政府还委任软银的孙正义(Mayayoshi Son)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及阿布塔比王储默哈末为新首都顾问团主席。部长还表示软银的投资额估高了，根据预算，只要有250亿美元就够了。

新首都工程的发言人西迪(Sidik Pramono)向记者表明，关于孙正义在新首都顾问团的席位还没有敲定，“有关新首都特区的组织结构和人事委任，将由‘新首都宪法’延伸而出的总统指令(Perpres)统一安排，如今，国家发展与相关部门正在进行筹划。”有关国外投资机构有意进行工程投资的信息以及相关承诺，还必须与政府进一步磋商。

《罗盘网》(KOMPAS.com)于12日援引西迪的话说，新首都的建设资金仍然立足于当初的规划，尽量少用国家储备资金(APBN)，而吸引来

自私营企业或投资机构。日本软银的投资意愿是孙正义于2020年向总统提出的，如今，也是软银本身表达退出投资新首都建设的计划。孙正义在《亚洲日报》(Nikkei Asia)说，仍有兴趣投资印尼企业的启动资金。

《共和网》(REPUBLIKA.CO.ID)同日报道，虽然日本软银已表态不参与新首都建设的一些大型企业能够补上这个缺口。《咖啡室》民调机构的创办人亨德里(Hendri Satrio)对媒体表示：“看来政府认为日本软银的引退不是大问题，因为已有金光集团(Sinar Mas Land)的前高管被委任为新首都特区的副首长。”自从确认被委任新首都特区副首长一职后，多尼已依法从“金光地产”引退以面对新的挑战。但亨德里坚信：“所以政府对日本软银的引退从容应对，因为已有金光集团。”这可能也符合逻辑。

为何当年软银大张旗鼓表示要投资，如今却虎头蛇尾？分析认为，或许因日本经济在两年疫情中欲振乏力，或者只是政治的烟幕弹？因为日本在印度、越南的投资项目也敷衍拖沓。政府应尽量避免中国企业在新

首都直接投资，以免反对派在鸡蛋挑骨头，抹黑总统。

《国际日报》14日称，佐科总统伉俪与一群高官13日抵麻里巴板(Balikpapan)市，14日前往新首都努山达拉零公里点举行祭拜仪式；

全国33名省长将各省的水与土融进“群岛神壶”(Kendi Nusantara)储放在新首都的坐标上，寓意国运长久、物阜民丰。

兴建新首都的伟大计划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不少具有人才资历、营运资金、雄才大略的国内企业，相信中央政府及新首都特区团队必能战胜困难，实现新首都的宏伟理想。

慰勉

——为苏北旅雅京郑金华前辈而写

■ 万隆：黄景泰

不管疫情续多久，时间照样慢慢走。
生命可贵要保留，身心健康别易丢。
品味人生无止境，共赏生命之旅游。
您我有苦有忧愁，平心静气要永修。

父亲的乡愁

■ 棉兰：晓杨

飘零半世，落户南洋，蕉风椰雨。
独自举杯咖啡，是苦涩，还是香甜？
不堪回首当年，思念乡情切，恋童年，
青梅竹马，风筝断线飘天际。
日落月升星闪耀，半世纪，身似蒲公英。
家乡遥不可及，日久他乡成故乡，入乡随俗。
拼搏奋斗建立家园，谁解我愁肠离绪？流云月影疏。

华人时装设计师 (3)

欧阳春梅 (MYRA SIDHARTA)

(Upakarti)奖，这是服装设计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玛尔迪亚娜·伊卡(Mardiana Ika)在北苏门答腊的先达市(Pematangsiantar)出生，登记名为徐愈安(Djie Joo Ann)。她在伦敦时装学：接受教育，因在香港和峇厘岛销售“布多尼”(Butoni)品牌作品获得成功。她在设计作品时通常只用黑白两色。玛尔迪亚娜也是峇厘时装周的宣传人和执行人。峇厘时装周随后催生了印尼时装周等一系列商业性的时装周。此外，徐愈安也是第一位成功开创国际时尚生意的印尼时装设计师。她的许多灵感来源于印尼元素。

张淑清(Chang Shu Ching, 印尼名苏珊·布迪哈尔佐Susan Budihardjo)曾在伦敦和加拿大接受设计师教育。她在雅加达取得成功以后，于1980年在雅加达建立了一所名为“服装设计

教育机构”的学校(Lembaga Pendidikan Tata Busana, 简称LPTB)。在这所学校，张淑清培养了许多著名设计师，如阿德里安·颜·迪迪·布迪哈尔佐(Didi Budiharjo)及斯巴斯蒂安·古纳万(Sebastian Gunawan)等人。这所学校一年制课程可以教授学生非常全面的课程内容，从解剖学、制作服装纸样、设计服装、时装历史、认识纺织品、印刷技术到电脑辅助设计，应有尽有。

陈珠仙(Tan Tjoe Sian, 印尼名安妮·阿凡蒂Anne Avantie),在三宝壟(Semarang)出生。尽管陈珠仙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服装设计教育，但是她的作品优雅迷人，深受大众喜爱。她的成名主要是因为对民族服装改良的改良。有人批评她的大胆，而安妮回应道，她并没改变人们心中神圣的格峇雅(Kebaya, 印尼妇女穿的



陈珠仙 (Tan Tjoe Sian, 安妮·阿凡蒂 Anne Avantie)



玛尔迪亚娜 (Mardiana) 右与作者在一起

女设计师

对男性设计师的关注并不表示女性在时装界的地位不如男性。有一些女设计师颇有成就，她们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林丹丽(Liem Tan Lee, 印尼名丽莉·莎琳 Lily Salim)毕业于德国(柏林)，在成衣制作方面成绩斐然。她每个月可以制作4,000件成衣，这些服

装在她设立的“萨亚达”(Saada)专柜和时装店出售。

她与伯拉尤迪·阿特莫迪尔佐(Prayudi Atmodirdjo)及善西达尔·伊萨(Syamsidar-Isa)一起成立了第一工作室，大力发展时装业，也就是借助成衣系列促进时装业的发展。为表彰她在与布料工匠合作方面的贡献，1987年政府颁给她乌巴卡尔迪

场时尚秀馆和格兰印尼商场(Grand Indonesia)。安妮是为2013年峇厘岛世界小姐选美比赛设计礼服的时装师之一。陈珠仙不仅关注时尚界，她也热衷于社会活动。她负责管理的脑积水患者爱心基地(Wisma Kasih Hydrocephalus)帮助解决脑积水患者的所有问题。她还是一些专科学校培养开发女学生天赋。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